

中外名人 教师生涯 研究

ZHONGWAI MINGREN
JIAOSHI SHENGYA YANJIU

谭林 范怡捷 编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名人教师生涯研究/谭林 等编著.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5364-9197-7

I. ①中… II. ①谭… III. ①名人—生平事迹—世界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9328 号

中外名人教师生涯研究

编 著 谭林 等

出 品 人 钱丹凝
责任编辑 吴晓琳 戴 林
封面设计 梦幻四人组
责任出版 欧晓春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官方微博: [http://e. weibo. com/sckjcb](http://e.weibo.com/sckjcb)
官方微信公众号: sckjcb
传真: 028-87734039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印 张 5.75 字数 145 千
印 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ISBN 978-7-5364-9197-7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如需购本书, 请与本社邮购组联系。

地址/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电话/(028)87734035 邮政编码/610031

前言

教师是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本书是中国教育学会“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学校教育最优化实验与研究”子课题“中国近现代名人教师生涯研究”部分成果。

本书按出生年月先后介绍了部分中国和外国名人的教师生涯，似乎让我们回到了昔日的课堂：清末民初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严复；清末民初文化怪杰——辜鸿铭；清末民初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教育家——康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章太炎；清末民初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徐特立；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王国维；宗教史学家、教育家——陈垣；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鲁迅；现代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钱玄同；近代民主革命家、语言文字学家——黄侃；现代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陈寅恪；民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胡适；人民教育家、思想家、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梁漱溟；作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叶圣陶；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吴宓；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钱穆；现代著名作家、语言学家——林语堂；著名现代诗人、散文家——徐志摩；民国散文家、诗人——朱自清；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闻一多；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沈从文；德国哲学家——康德；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大科学家——爱因斯坦；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维特根

斯坦等。

本书中国教师篇由谭林撰写，外国教师篇由范怡捷撰写。

由于学识浅陋、受材料所限，本书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海涵。

目 录

中国教师篇

严 复	(002)
辜鸿铭	(009)
康有为	(014)
蔡元培	(022)
章太炎	(027)
梁启超	(030)
黄 兴	(038)
徐特立	(042)
王国维	(049)
陈 垣	(055)
鲁 迅	(060)
熊十力	(069)
钱玄同	(072)
黄 侃	(075)
陈寅恪	(080)
胡 适	(090)
陶行知	(098)
梁漱溟	(103)
叶圣陶	(109)
吴 宓	(118)
钱 穆	(123)

林语堂	(131)
徐志摩	(135)
朱自清	(140)
闻一多	(146)
沈从文	(152)

外国教师篇

康 德	(158)
黑格尔	(164)
马克斯·韦伯	(168)
爱因斯坦	(171)
维特根斯坦	(174)

中国教师篇

严 复

严复（1854—1921），中国清末民初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严复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会办和总办、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多年从事教师职业。

一、福州船政学堂教师

1879年9月底，严复赴母校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当时严复月薪百元。严复执教于福州船政学堂，认真教书育人。

二、北洋水师学堂教师

1880年8月，严复到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在学制、课程设置以及教学环节的安排中，严复以英国的同类学校为楷模，注重课堂学习，把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除课堂外，工厂实习或客船是必经阶段，占有很大比重，讲求实效，从严办学，奖优汰劣，一切都以能否造就合格的有用人才为宗旨。史载，严复是个好教师，“严教习踵格林之规模，授立表之算法，虽朱仁杰之《四元玉鉴》，李治之《测圆海镜》，算家所惮为艰深者，无难迎刃而解。故其阐理一项，多为卑职丰禄从前所未习，出其题纸以示俄国水师兵官，诧其精审，疑为英国算家所出……”“良由正教习严游击专讲水师算学二十余年，其奥窔曲折一周知，学生中时有不能领悟，一经口授指画，无不融会贯通。正教习严游击授课，不惮繁难，苦心启牖，时阅三载，日起有功”。“水师学堂正教习严宗光精习西学，于测算格致具有根柢”。

1889年3月严复升任北洋水师学堂会办后，最先在北洋水

师学堂开设体育课，使北洋水师学堂成为我国最早开设体育课的学校。

学堂的教职让严复避开海军兵舰上的繁杂军务，专注海军人才的教育教学，让严复能够在学堂的环境中，以学者的身份继续交往西方人士，了解世界情势，研读西学名著。

1881年，严复通读了英国学者斯宾塞的《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 现译为《社会学研究》），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经典理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来，他在为这部著作的中译本所撰的“译余赘语”中，回顾了自己阅读此书的体会，“不佞读此在光绪七、八之交，辄叹得未曾有。生平好为独往偏至之论，及此始悟其非，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

此后，从1895年春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的五篇政论所涉及的西学理论，可以看出严复在此前所阅读研究的西学社会科学著作，囊括当时所有最经典的世界社会科学名著如：达尔文《物种起源》《人类的由来及其性选择》，斯宾塞《第一原理》《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原理》《教育论》，亚当·斯密《国富论》等。

1894年11月，严复对儿子严璩说：“我近来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觉世间唯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严复从未放松钻研的是有助于国家富强的西方社会科学，以此为“世间唯有”的“真实事业”。

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执教到1900年，近20年。作为水师学堂的教师，严复有机会接触北洋官场上层，又始终与下层水兵学员、普通民众保持密切联系，深切感受着民间疾苦，因此严复能不断深入了解社会，以西学理论联系中国实际，思索改造社会的良方。

三、天津俄文馆教师

1896年严复创办了天津俄文馆——中国最早的俄语专门学校。这里有利条件是“以水师学堂空房为俄文生肄业之所”，可节省学堂建设开支。俄文馆开办伊始，严复就亲自拟定课程、聘请教师及管理一切教务。严复对俄文馆教学认真负责，据《国闻报》记载，1898年5月26日至27日，严复亲自主持俄文馆学生的“季考”。

严复虽奉命创办俄文馆，但他看出沙俄对我东北的用心，预见到俄、日争夺我东北必有“一战”。1897年11月9日致吴汝纶的信中就指出，“长城东北必非吾有”。他想到中国为列强侵略几至“土崩瓦解”，常于半夜起来大哭一场。

四、安徽高等学堂教师

1906年3月严复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严复初到安徽高等学堂，见“师无所为教，弟无所为学”，认为此乃国家徒存学堂之名，而未能收其效。他指出维新人士“今新立学堂，革官制，而必曰，学堂之学，与天下之官相应，则必其治学之材，幸而皆能治事则可，倘或不然，则用之而不效，则将疑其学之非，其甚者，则将谓此学之本无用……”这是当时办学堂、培养人才未能细分用途所出现困惑的现象。严复指出学堂培养人才，应分治学和治事两种人才。学生通过学习后能“观理极深，虑事极审，宏通渊粹，通贯百物之人”乃治学之才。而治事之人，则“崛起草莱，乘时设施，往往合道”，不必皆由治学之才。其意为治学之人未必能胜任做官治事，而做官治事也不必都是学术人才。严复还以“使强奈端以带兵，不必能及拿破仑也，使毕士马以治学未必及达尔文也”为例证之。一个人既能治学又能治事，是“恒不能相兼”的，严复明确地告诉学生们：“学成必予以名位”，否则不足以劝学。而名位分为学问、政治二名位；学问名位予学成

之才，政治名位给入仕之人，若是全才，可兼及学问、政治二名位的严复劝大多数青年学子应根据自己的情况“任取一途”。他希望从事农工商之学的人要多于入仕之学的人，“则国治”。若人人争入仕之学，而不愿学农工商之学，“则国不治”。如果不搞科学，发展农工商经济，办好实业，人人都想着争权当官，“则天下大乱”。严复要求学生们注意“今日学校官制之大弊”，不要像以前书院学生个个搞八股策论的入仕之学，应当去学习西学中的诸多社会和自然科学。以前学堂从未告之学生治学治事应分二途。学生们以前那样“得科举而已，应试之具之外，一物不知”。严复要求学生完成学业后，能以专门之学任专门之事，治学治事，各负其责，利国益民。

严复在安徽高等学堂执教，要求学堂师生重视教育与国家的关系。甲午海战惨败后，朝廷上下皆思考此前教育存在的问题。后清廷下诏天下遍立学堂。严复认为：虽然学堂立矣，办之数年，又未见其效也，既然“上之取人，下之进身，一切皆出学堂”，教育青年学生“身为国民”在此内忧外患、国家颓衰境遇中，“必人人思所以救此社会，使之于明盛，而无陷于阽危，则今世之中国人，所人人共负之责任，而不可一息自宽者也”。严复要求学堂师生要爱国，保国保种，必须搞好教育，以教育发达，科学昌盛国力增强，才能达到救国保种之目的。严复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不如人，就是民智、民力、民德不如人。要改变此况，就要通过教育来加以提高。

严复在学堂期间重视西学，并倡言科学民主。何谓“西学”？严复说“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前半句是指科学，后半句是指民主。他又说“中国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愈明矣”。严复在课程设置上重西学，并保留国学之精华，而去旧学之糟粕。他要求学生学西学“必用西文西语而后得其真”，并进一步强调：“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他说：“自中土士大夫欲通西学，而以

司其言语文字为畏途，于是争求速化之术，群起而谈译书……学堂所习书，皆必待译而后具……则读译书者，非读西书，乃读中土所以意自撰之书而已。”他要求学生认识到，学西学，掌握真谛，必须学好外语，去读外文原著的重要性，以便更好地探求西学中的诸种科学之说和平等、自由、博爱、民权等知识。严复在学堂力倡西学，使不少安徽青年学生“对西方国家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产生了羡慕的心情……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是代替我国封建政治制度的最符合理想的好制度”。

严复自喻为老马为学生之导，即教导学生如何学习、研究西学。他引用英国学者赫胥黎、培根等人的言论，“世间无物为大，人为大；人中之物为大，心为大”，来说明人生第一要义之事，就是炼心积智。“炼心精，积智多为学者”，并指出西学求真，知识来源人类社会及自然界的活动。社会科学知识来自实践，自然科学知识要不断地观察和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也”。严复认为培根所说的“凡其事其物这两间之所有者，其理即为学者之所宜穷……知穷其理，皆资妙道”。赫胥黎所言的“能观物观心者，读大地原本书，徒向书册记载中求者，为读第二手书矣”。严复指出对自然，对社会能观物观心，“要知读无字之书”“读大地原本书”是第一重要的，这样长久的观察、试验，不断积累，不断地实践，可以形成各种多样的社会与自然方面诸种科学，这也是“西人后出新理，何以如此之多”的缘故。若要从书册记载中求者便只是读二手书了。若读西人二手书，也要学好外语去读原著，得其原义。读别人翻译的书有可能受翻译者的局限，还可能受其误导。严复还教育学生，即使读二手书，也要动脑筋，自己判断鉴别。因为外文原著“人心见能不同，而常常有误，更何况还有翻译过来不准确的。这样，常常有误，而我信文，从而误矣”，这些是西方格物穷理家所忌的。中西二学比较，中国人数大多数是从书册记载中读书的，往往是“不独因人作计，终当后人……从而误矣”。严复还讲学习时要注意思考表象和本质的关

系，西学学问又分专门之用，如“算学以核数，三角以测量，化学以制造，电学则以为电工，植物学则以栽种之类”。严复告诉学生们专门学问作用很大，但不是最大，最大的是“公家之用者，举以炼心制事是也”。严复教导青年学生学好西学的目的是“保国善群之事”。严复希望学堂的学生年富力强，志向高远，努力于西学，选择专门之用或公家之用“任自为之”。

严复对学生采取严格的考试制度，以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取得好成绩，早日成才，报效祖国。据当时由寿州选送到安庆投考高等学堂的高语罕在同乡学生中所见所闻的回忆：当时高等学堂的学生素来是散漫惯了的，严格的考试着实来得厉害，所有学生都得经过他（严复）信任的教职员严密地考试之后，重新分科。至于行将毕业的学生，也得经过严密地考试后，始得毕业。不及格者分别留级淘汰。这对高等学堂的学生是“晴天霹雳”。这样学生们在严格要求之下，只有勤奋学习了。严复对严考学生甚为满意，这次“高等学堂大考，退者至卅余人，全城（安庆）震惊，语吾手辣。然经此一番淘汰，学生知功课之重，且一切唯在求己，均无所用人情势力。此堂后望必成矣”。

1905年12月17日晚，严复为全校师生作“宪法大义”的演讲：“吾国近年以来，朝野之间，知与不知，皆谈立宪。立宪既同立法，则自五帝三王至于今日，骤听其说，一若从无有法，必待往欧美考察而归，然后为有法度也者，此虽五尺之童，皆知其言之谬妄矣。”这种讽刺语调显然是冲着朝廷来的。他在家信中直截了当地说：“京事俟回家时细谈，大抵黑暗糊涂，不大异三年前，立宪变法，做面子骗人而已。”尽管如此，严复仍借机普及西方宪政知识，“改革之顷，破坏非难也，号召新力亦非难也，难在乎平亭古法旧俗，知何者之当革，不革则进步难图；又知何者之当因，不因则由变得乱”。当严复发觉台下师生和官僚对立宪仍似懂非懂时，便以本学堂为喻加以形象阐释。他说，本学堂如同一个社会，有监督、有教、斋、庶三长；有学生200余

人，有本籍和客籍；亦有事务人员、厨师等人。以目前而论，本学堂实行的是专制之制也。怎么知道是专制呢？因为师生均在受治之位，相当于宪法的章程并非他们议立。要想改为民主立宪，如何实施？师生人人有选举代议员的资格，并因本籍客籍权利之不同，各成一众，以举议员，分为两厅，这个类似外国参众两院。议会既立，就公举管理全校之监督，以任期限定之；按英国体制，监督类同宰相。监督既立，由他任命他所信赖的教、斋、庶三长，重要事项交给两厅公议之，通过者即可实施，监督自己也须遵守之。“顾欲为立宪之国，必先有立宪之君，又必有立宪之民而后可。立宪之君者，知其身为天下之公仆，眼光心计，动及千年，而不计一姓一人之私利。立宪之民者，各有国家思想，知爱国为天职之最隆，又济之以普通之知识，凡此皆非不学未受文明教育者之所能辨明矣。”而这一切，又可以归结到“教育”二字上，归结到堂下的师生身上：“……是故陶铸国民，使之利行新制者，教育之大责，此则仆与同学诸子所宜共勉者矣。”^⑩真可谓振聋发聩，言近旨远。

参考文献：

- [1] 冯宝善. 严复传 [M]. 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
- [2] 严复. 严复集 [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 孙应祥. 严复年谱 [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 [4] 罗耀九. 严复年谱 [M]. 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
- [5] 皮后锋. 严复译传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清末民初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语言。辜鸿铭先后任官员、教师、翻译、报刊主编等职。

一、 武汉自强学堂教师

1893年1月武汉自强学堂成立，辜鸿铭兼任方言教习。辜鸿铭要求凡辜氏门生两年内必以西语对答如流。1896年，学堂实施改革，增设德、法、俄、日诸文。辜鸿铭仍于公务余暇兼授英语、德语。辜鸿铭授课极严，全校师生景仰，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

二、 上海南洋公学教师

1910—1911年辜鸿铭任南洋公学教务长，同时主讲英文，辜鸿铭上课不拘泥于教材，往往海阔天空宣讲一通，然后叫学生课后自习书本。

傅东华回忆，辜鸿铭以望远镜论东西方，最终引出一个观点，“我们读西洋史，应该拿我们自己做本位，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外国人是夷狄，中国人如果不拿自己做本位，难免要化为夷狄”“辜鸿铭于宣统二年受聘来校，担任教务长，并教我们国际公法。先生貌似老学究而性情古怪，看不起当时回国的留学生，说他们是倒看望远镜，看得国内一切事物都是渺小不足道的。辜先生时常亲到各教室视察，听到教员讲解有错误处，立刻予以指正，不留情面，教员们大都敢怒不敢言。先生对待学生比较宽厚，教课虽很认真，有时还要我们背熟国际公法若干条文，但到

考试时，打分数并不太紧，故深为同学们所爱戴。辜先生自幼就留学英、德、法各国，精通多国语言文字，在清末文学界与严又陵氏齐名”。

三、北京大学*教师

1915年4月，辜鸿铭任教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此时辜鸿铭影响在西方文化界如日中天。时人这样评价他：“在我的记忆中，辜鸿铭这个人可说是怪才，他的‘才’可能有人能相伦比；至于他的‘怪’，却是无人能与伦比的。”

民国初年辜鸿铭至北大上课时，行必坐轿，衣龙补长袍，足厚底朝鞋，头戴花翎顶，其辫辘辘，提水烟袋而登讲坛。

辜鸿铭在北大授课的风采，他的亲炙弟子罗家伦回忆说：“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因此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主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困难，可是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辜鸿铭英文很好，由于从小未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中文反倒不尽如人意，不仅译文有时显得生硬，板书也常常出错，“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辜鸿铭从小受西方教育方式影响较大，所以并不完全拘泥中国的教学方式，上课时也经常跑题，信马由缰。

* 北京大学简称“北大”。

辜鸿铭上课有时很幽默。“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补记辜鸿铭先生》一文中也曾有类似记载：“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到我们乐而忘倦，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可见，辜鸿铭上课比较生动的，深受学生欢迎。正式上课这天，学生们见他站到讲台上，不带讲义教材，滔滔陈述起来，他说：“我讲英文诗，要你们首先明白一个大旨，即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而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威尔士等七国国风。”就这么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最后辜鸿铭告诉他们：“像你们这样学英诗，是不会有出息的。我要你们背的诗文，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才行。不然学到头，也不过像时下一般学英文的，学了十年，仅目能读报，伸纸仅能写信，不过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终其一生，只会有一小成而已。我们中国的私塾教授法就很好，开蒙不久，即读四书五经，直到倒背如流。现在你们各选一部最喜爱的英诗作品，先读到倒背如流，自然已有根基，听我讲课，就不会有困难了。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记忆力是很不错的，中国人用心记忆，外国人只是用脑记忆。我相信诸君是能做好的。”学生们只有依着他的意思，日夜用功背诵洋诗。待到上课时，学生们用中文问他，他用英文答复你，倘若用英文问他，他偏偏又用中文答复。

有一次，辜鸿铭突然对学生们说：“今天，我教你们洋离骚。”他拿出一本英文诗，原来这“洋离骚”正是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的一首悼亡诗——Lgcidas，悼念诗人淹死的亡友而作的。这首长诗，学生们从第一页翻开起，直到这一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仍然翻的是第一页。辜鸿铭在课堂上却节课都滔滔不绝，不是骂洋人就是骂一班坏了君臣大节、礼义廉耻的乱臣贼子，要